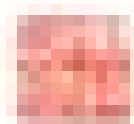


漫說文化

钱理群 陈平原 黄子平 著



說說文化



漫說文化

钱理群 陈平原 黄子平 著

湖南教育出版社

漫 说 文 化

钱理群 陈平原 黄子平 著

责任编辑：邹树德

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印张：4.875 字数：130000

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
ISBN7—5355—2462—1/G·2457

定价：6.80 元

本书若有印刷、装订错误，可向承印厂调换

漫说“漫说文化”（代序）

□陈平原□

据说，分专题编散文集我们是始作俑者，而且这一思路目前颇能为读者接受，这才真叫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。当初编这套丛书时，考虑的是我们自己的趣味，能否畅销是出版社的事，我们不管。并非故示清高或推卸责任，因为这对我们来说纯属“玩票”，不靠它赚名声，也不靠它发财，说来好玩，最初的设想只是希望有一套文章好读、装帧好看的小书，可以送朋友，也可以搁在书架上。如今书出的很多，可真叫人看一眼就喜欢，愿把它放在自己的书架上随时欣赏把玩的却极少。好文章难得，不敢说“野无遗贤”，也不敢说入选者皆“字字珠玑”。只能说我们选得相当认真，也大致体现了我们

前

MAN SHUO WEN HUA QIAN YAN



对 20 世纪中国散文的某些想法。“选家”之事，说难就难，说易就易，这点如鱼饮水，冷暖自知。

记得那是 1988 年春天，人民文学出版社约我编林语堂散文集。此前我写过几篇关于林氏的研究文章，编起来很容易，可就是没兴致。偶然说起我们对 20 世纪中国散文的看法，以及分专题编一套小书的设想，没想到出版社很欣赏。这样，1988 年暑假，钱理群、黄子平和我们三人，又重新合作，大热天闷在老钱那间 10 平方米的小屋里读书，先拟定体例，划分专题，再分头选文；读到出乎意料之外的好文章，当即“奇文共欣赏”；不过也淘汰了大批徒有虚名的“名作”。开始以为遍地黄金，捡不胜捡；可沙里淘金一番，才知道好文章实在并不多，每个专题才选了那么几万字，根本不够原定的字数。开学以后又泡图书馆，又翻旧期刊，到 1989 年春天才初步编好。接着就是撰写各书的前言，不想随意敷衍几句，希望能体现我们的趣味和追求，而这又是颇费斟酌的事。一开始是“玩

票”，越做越认真，变成撰写 20 世纪中国散文史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。只是因为突然的变故，这套小书的诞生小有周折。

对于我们三人来说，这迟到的礼物，最大的意义是纪念当初那愉快的学术对话。就为了编这几本小书，居然“大动干戈”，脸红耳赤了好几回，实在不够洒脱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确实有点好笑。总有人问，你们三个弄了大半天，就编这几本小书，值得吗？我也说不清。似乎做学问有时也得讲兴致，不能老是计算“成本”和“利润”。唯一有点遗憾的是，书出得不如以前想象的那么好看。

这套小书最表面的特征是选文广泛和突出文化意味，而其根基则是我们对“散文”的独特理解。从章太炎、梁启超一直选到汪曾祺、贾平凹，这自然是与我们提出的“20 世纪中国文学”概念密切相关。之所以选入部分清末民初半文半白甚至纯粹文言的文章，目的是借此凸现 20 世纪中国散文与传统散文的联系。鲁迅说五四文学发展中“散文小品的成功，几乎在小

前

MAN SHUO WEN HUA QIAN YAN

言

说戏曲和诗歌之上”(《小品文的危机》),原因大概是散文小品稳中求变,守旧出新,更多得到传统文学的滋养。周作人突出明末公安派文学与新文学的精神联系(《杂拌儿跋》和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》),反对将五四文学视为欧美文学的移植,这点很有见地。但如以散文为例,单讲输入的速写(Sketch)、随笔(Essay)和“阜利通”(Feuilleton)固然不够,再搭上明末小品的影响也还不够;魏晋的清谈,唐末的杂文,宋人的语录,还有唐宋八大家乃至“桐城谬种选学妖孽”,都曾在本世纪的中国散文中产生过遥远而深沉的回音。

面对这一古老而又生机勃勃的文体,学者们似乎有点手足无措。五四时抬出“美文”的概念,目的是想证明用白话文也能写出好文章。可“美文”概念很容易被理解为只能写景和抒情;虽然由于鲁迅杂文的成就,政治批评和文学批评的短文,也被划入散文的范围,却总归不是嫡系。世人心目中的散文,似乎只能是风花雪月加上悲欢离合,还有一连串莫名其妙的

前

MAN SHUO WEN HUA QIAN YAN

言

比喻和形容词，甜得发腻，或者借用徐志摩的话：“浓得化不开”。至于学者式重知识重趣味的疏淡的闲话，有点苦涩，有点清幽，虽不大容易为入世未深的青年所欣赏，却更得中国古代散文的神韵。不只是逃避过分华丽的词藻，也不只是落笔时的自然大方，这种雅致与潇洒，更多的是一种心态、一种学养，一种无以名之但确能体会到的“文化味”。比起小说、诗歌、戏剧来，散文更讲浑然天成，更难造假与敷衍，更依赖于作者的才情、悟性与意趣——因其“技术性”不强，很容易写但很难写好，这是一种“看似容易成却难”的文体。

选择一批有文化意味而又妙趣横生的散文分专题汇编成册，一方面是让读者体会到“文化”不仅凝聚在高文典册上，而且渗透在日常生活中，落实为你所熟悉的一种情感，一种心态，一种习俗，一种生活方式；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借此改变世人对散文的偏见。让读者自己品味这些很少“写景”也不怎么“抒情”的“闲话”，远比给出一个我们自认为准确的“散

前

MAN SHUO WEN HUA QIAN YAN

言

文”定义更有价值。

当然，这只是对20世纪中国散文的一种读法，完全可以有另外的眼光另外的读法。在很多场合，沉默本身比开口更有力量，空白也比文字更能说明问题。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我们淘汰了不少名家名作，这可能会引起不少人的好奇或愤怒。无意故作惊人之语，只不过忠实于自己的眼光和趣味，再加上“漫说文化”这一特殊视角。不敢保证好文章都能入选，只是入选者必须是好文章，因为这毕竟不是以艺术成就高低为唯一取舍标准的散文选。希望读者能接受这有个性有锋芒因而也就可能有偏见的“漫说文化”。

1992年9月8日于北大

岁月无情又多情

钱理群

今年的北京除夕夜总觉得有些异样：陡然失去了鞭炮繁响的掩饰，生命的流逝感便于一片沉寂之中直逼人的心坎。何况面前正放着子平、平原从异国他乡寄来的追念“当年”的文章，单是那题目“十年一觉”，就搅得人不得安宁。

……我坐在书桌前，凝视窗前的黑夜，以及远处的灯光，那闪烁不定的，仿佛是一组生命的数字：“1988年夏—1989年春—1990年秋（1992年春）—1993年冬（1994年初春）”，正是“编书—写序—出书—为‘序’作序”的日子：一套“漫说文化丛书”经历了几度春秋，而且，无论对国家，对个人，又都是如此不平凡的岁月！我于是重又跌入历史的隧道，在艰难的迂回中爬行……

前

MAN SHUO WEN HUA QIAN YAN

言

这段心灵的历史的开端仿佛充满了温馨：1988年的春夏，对于我们三人都是令人怀想的岁月，大家安心地做自己想做的、愿做的事情：平原在写出了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的博士论文后，又完成了《20世纪中国小说史》的第一卷，子平那些脍炙人口的当代文学评论，我的《周作人传》中最有灵气的部分，都写于这个时节。当时我们颇有一种自由感与松弛感，能够以洒脱、从容的心态来品味文学史上有文化意味的“闲话”风散文，并且有了编“一套文章好读、装帧好看的小书”，供自己与三五好友赏玩的“雅兴”，如子平、平原所回忆，《漫说文化》丛书的最初动议就产生于这种宽松、宽容的文化氛围之中。但从1988年冬天开始，文人的心态开始浮躁，气氛也日趋严峻起来。我们三人都身不由己地卷入浪潮中，却又感到了几分惶惑。1989年5月我在为编入“文丛”的《说东道西》写“序”时，情不自禁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：“我于是发现我们的‘学者’都文学化、情绪化了；我又想起了鲁迅的话：文学需要热，学

前

MAN SHUO WEN HUA QIAN YAN



术研究则是需要冷的。那么，我们现在还不是潜心做学问的时代。‘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’，不仅指外在客观环境，更指我们内心的不平静。这既可悲，而又无可奈何。自然，我们只能在绝望中挣扎。因此，我们一面不能不不断地陷入时代情绪的漩涡中，一面又不断呼唤理性与冷静”。但政治的逻辑远比文人的呼唤更有力量，也更严峻。我的序言竟被勒令重写，而且终于有了这一天：我和我的妻子，平原、晓虹夫妇，得后、赵园夫妇，聚集在蔚秀园我那间狭窄的书房里，与“去国远游”的子平、玫珊和他们的孩子话别。我至今仍保留着当时摄下的照片：我们依旧笑着，却也掩不住内心的凄然与茫然，我们絮絮地谈着闲话，小心地避开沉重的离别，又在偶而的沉默里，感受到心灵的相应与相契：坚信自己与对方都会坚守住某一块精神的圣地。我们果然谁也没有停笔：平原写出了他的《千古文人侠客梦》，我写了《丰富的痛苦》，子平则出版了论文集。当读到子平新书上“幸存者的文学”赫然几个大字时，我

前

MAN SHUO WEN HUA QIAN YAN



甚至受到了灵魂的震动；几乎同时，子平在听说我患病仍不肯放弃写作时，也感到鼻酸：尽管远隔重洋，我们竟有如此的心灵的感应，还有什么比这更可珍贵的呢？

后来，《漫说文化》丛书终于出版，而且成了畅销书，而且“引”出了无数花花绿绿的这“丛书”、那“选本”，在“文化市场”上很是热闹了一阵子。有人说我们是“始作俑者”。我们反而越发不安，甚至感到是“命运”又一次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。当看到我们心血的结晶为了商业的需要而惨遭凌迟——序言被删，煞费苦心的编排被任意打乱，其中一本连编者的名字也干脆挖去……，我们真是哭笑不得。当年编书的雅兴，理想主义的天真，如今化成了自我解嘲。

如今又煞有介事地为编辑成册的序言写篇“序言”，至少在我是出于一种“顽童”的心态：既表现老天真的痴心不变，又要戳一个洞，与“时尚”闹点小别扭，如此而已。

1994年除夕写毕于南郊寓所

十年一觉

陈平原

一场秋雨，一层凉意。东京大学校园里的银杏开始飘落，进校门便是一地金黄。如果恰逢正午的太阳，景色更为壮观。报载北京前两天下雪，想来北大校园里的银杏早已凋零。银杏有大小，一地金黄的时间也有先后，可两座校园确有不少相似之处，难怪刚来时老有梦里曾相见之感。

客居异国，不免思乡。忽忆起杜牧诗句：“十年一觉扬州梦，赢得青楼薄倖名。”并无牧之之才气和艳遇，也难得“烟花三月下扬州”，只是凭空觉得“十年一觉”四字惊心动魄。

屈指算来，从我第一次到北大寻梦，到今秋东渡访学，刚好十年。人生能有几个“十年”？更何况适逢从“而立”走向“不惑”！倘

前

MAN SHUO WEN HUA QIAN YAN

言

若不是此次偶然的出游，造成一种时空的距离和陌生化效果，或许不会如此清醒地“追忆逝水年华”，也不会如此真切地感受到十载燕园梦的飘逝。

就好像秋风注定扫落叶一样，一旦意识到梦境的存在，也就意味着其即将隐去。明年秋天还会重见北大银杏的辉煌，可那已经是新一轮生命的开始。每念及此，不无伤感。即使人生真的如戏，可以重排一场，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奇迹出现。但静夜凝思，仍然无法平静地接受十载燕园梦已经永远飘逝这一事实。

这自然只是一种“凡人的悲哀”。既不能“知天命”，也就没必要故作达观。趁着梦境还未完全消失，不时重温一下“过去的好时光”——其实，过去的时光未必真的那么美好，只不过一去不复返的东西总是让人牵肠挂肚。

十载燕园梦，自是以读书为主。在《我的读书生活》中曾分析四种类型的学友，论及“学友间各有所长，见识大致相当（学术观点不同无所谓），或合作，或竞争，谁也不欠谁，谁



也离不开谁”的“互补型”时，举的例证便是在北大时与钱、黄二兄的合作。这段描述只是举例说明，不免略去“前因后果”。说起“燕园雅集”，主要应归功于钱、黄二兄。不只是当年我见识无多，聊天时多带耳朵少带口；更因我之进北大，全靠二位“提携”。

1983年初春，我第一次坐上北行的列车。那时并没打定主意进北大，只是觉得北京的初春很有魅力：刚来时万木萧疏，才几天工夫，路边的柳树便日新月异，迎春花也不甘寂寞起来，一切都显得那么生机勃勃。相形之下，南国的四季常青反而乏味。当然，北京令人心醉的，还有琉璃厂的古书和故宫的红墙绿瓦。

这年的深秋，我第二次跨长江过黄河，目的是为毕业后进京工作探路。当时联系的单位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。进燕园拜会子平兄时，被劝知“一定得见见老钱”。在“钱老师”那间10平方米的小屋里聊了一个下午，临别时呈上我刚完成的《论苏曼殊、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》。据说当天晚上10点多，读过文章后，